

王明蓀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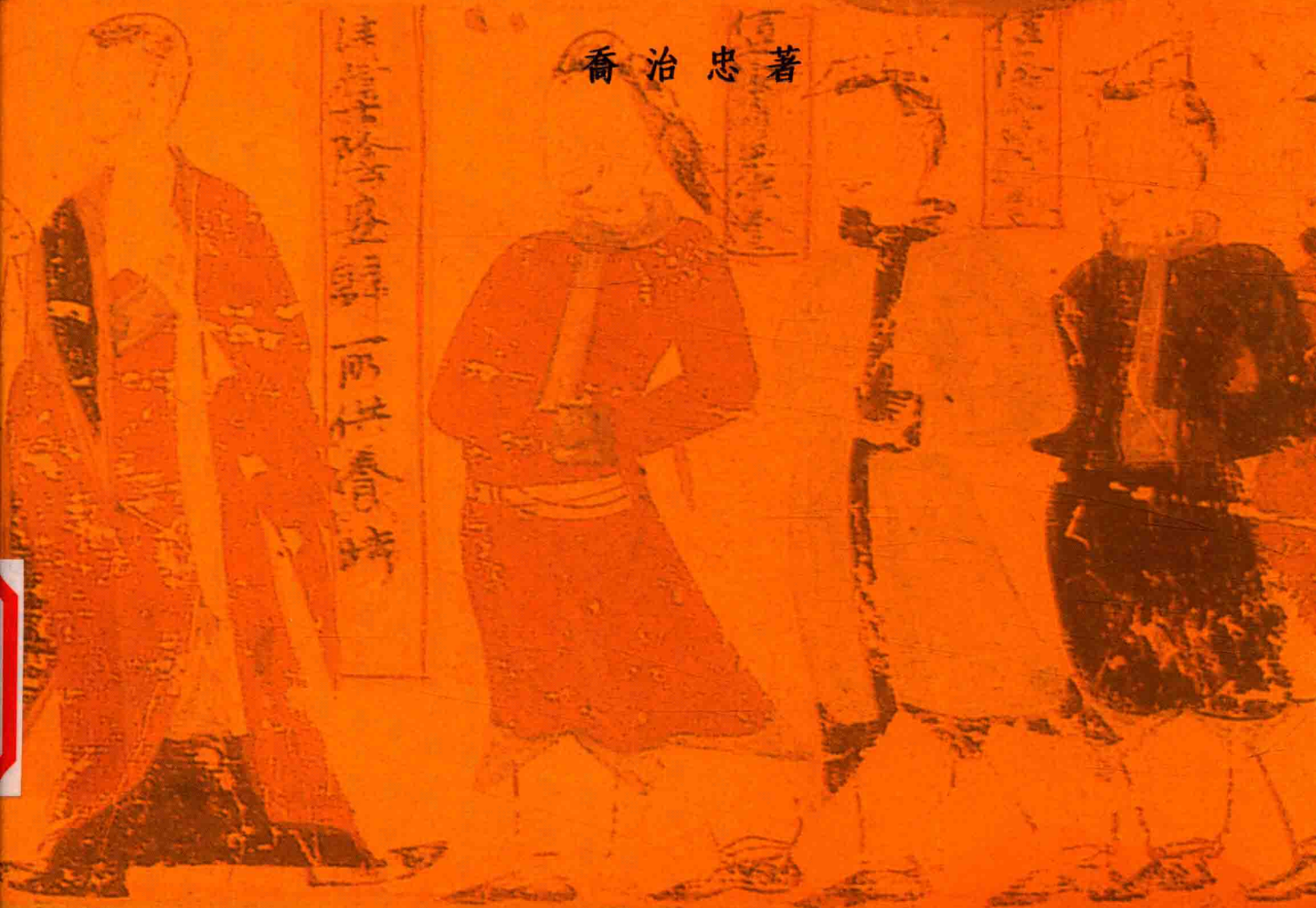
古代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六編 第三三冊

清代官方史學與 私家史學相互關係研究(上)

喬治忠著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六編

王明蓀主編

第33冊

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相互關係研究(上)

喬治忠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相互關係研究（上）／喬治忠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民 105〕

序 2+ 目 2+206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六編：第 33 冊）

ISBN 978-986-404-778-9（精裝）

1. 史學史 2. 清代

618

105014282

ISBN-978-986-404-778-9



9 789864 047789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六編 第三三冊

ISBN：978-986-404-778-9

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相互關係研究（上）

作 者 喬治忠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6 年 9 月

全書字數 537439 字

定 價 十六編 35 冊（精裝）台幣 6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相互關係研究（上）

喬治忠 著

作者簡介

喬治忠，天津市人，1949年7月生。歷史學博士，長期擔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中國史學史的研究與教學，致力於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學科的建設工作。現為郎坊師範學院社會發展學院特聘教授。1993年、1999年、2004年三次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立教大學做交換研究員，進行專題研究。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大型《清史》編纂項目、教育部社會人文研究基地重點項目等多種課題研究。撰有《眾家編年體晉史》、《清朝官方史學研究》、《中國史學史研究述要》（合作）、《清文前編》、《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中國史學史》、《增訂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合作）、《中國史學史經典精讀》等多種著述。發表學術論文140多篇，在清朝官方史學研究、中國史學史、中日史學比較研究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果，論著體現周密考證與理論思維相結合的特點，具有學術開拓性。

提 要

中國傳統史學的突出特點，就是形成了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兩條相互聯繫的發展軌道，二者互動、互補也相互排抑，這成為中國古代史學繁榮發展的重要原因。清廷將官方史學推拓到繁盛的高峰，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之間的矛盾與互動也呈現出許多新的景象。本書以此為研討的主題，曾立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並且通過驗收。

自順治朝至乾隆朝，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糾葛，在明史學方面尤為突出，這其中摻入了政治和民族問題（華夷之辨）的敏感因素。順治、康熙兩朝，出現「莊氏史獄」、戴名世《南山集》案等慘烈的文字獄，乾隆朝更密織文網，壓制私修史中的異端思想，並且曠日持久地追繳明季野史。這是官、私史學在特殊背景下的矛盾激化。同時，纂修《明史》也不乏官方、私家的良性互動，如康熙十八年始，纂修《明史》呈現過官方主導、朝野合作的局面。

乾隆朝官方大力纂修史書，而私家大多專注於歷史考據，形成了清代「盛世」史學的發展結構，即清廷掌控大型史籍的編纂，地方政府主修地方志，私家個體以歷史考據為主，文化幕府拾補官方纂修項目之遺缺，四種修史主體的分工、合作與競爭，各有其歷史研討的領域，官、私史學在整體上達到十分繁盛的程度。清季官方史學逐步衰退，但保持了當代史記述的基本的纂修格局，而對私家史學控制放鬆，也支持了部分私修史的完成，何秋濤《朔方備乘》、劉錦藻《皇朝續文獻通考》的編纂，皆有賴於官方的支持得以成書和流傳。而私家史學是更具活力的一方，不少史官借參與官修史而獲得資料，用於私撰史著，甚至有如蔣良騏者，私下抄錄清廷秘籍和檔案，撰成《東華錄》。

在清代官、私史學互動進程中，互補互益仍是主要方面，這應是研究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相互關係的基本估量。中國古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互動，為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一項創造，是區別於古代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特色文化。清朝官方史學特別發達，私家史學亦有長足的發展，二者的互動、互補、互有排抑，也比前代更加典型。

本書附載《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繫年要錄》，按時間順序考述清代史學演化歷程，很具學術參考價值。

本書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自選項目成果
項目號：05BZS001

序

《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相互關係研究》一書忝得出版界「大將軍」花木蘭的賞識，即將出版面世。關於本書的思路和結論，均概述於本書《緒論》，並且解析於全文，這裡想講講進一步的三點感受，以供學界思考與商榷。

第一，人類社會的出現和發展，使某些民族具備了史學得以生產和持續的條件，於是歷史學成爲一門重要的學術文化，經發展和傳播，遍及世界，歷史學是對人類社會以往歷程的回顧和總結。歷史學發展經過長期積累，需要對自身予以回顧和總結，即產生了史學史學科，這在認識論上，是層層「形而上之」的趨向，是思維抽象性的昇華。對於研治歷史學而言，未嘗不可以立足於史學史的研討，將理念和認識降臨到歷史學的探索，從而認識人類社會的本質。這有一個好處，即先明白了史學產生、發展的機制，對歷史記載的鑒別可能更爲深刻，用以指導歷史的研討，優勢相當明顯。我在《史學吟》中有「學史不知史學史，識見難言淺與深」詩句，即本於此意。

第二，中國史學史具備素材豐富、環節連續、內容系統的特點，是解析史學和歷史理論問題的極好範本。中國傳統史學的突出特點，是形成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兩條相互聯繫的發展軌道，此乃中國古代史學最爲發達興盛的根本原因。將中國史學史置於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互動、互補、又互相排抑的架構中考查，才能得出深入、準確和具有規律性的認識。中國這一史學特點，與西方古典史學全然不同，但中西史學深入比較，可以發現，古代中西史學皆包含求真與致用之間的內在矛盾，矛盾的焦點是二者孰爲第一位的問題。中國傳統史學中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互動，體現的就是求真與致用之

間的矛盾。因此，歷史學的產生和發展是有規律的，歷史學的規律比歷史規律清晰而易見。欲探索歷史規律，目標宏遠而難度極大，無妨先探索史學發展的規律，取得新思路、新方法，再解析歷史的規律。

第三，古代中西史學，都內在地具備求真與致用的矛盾，這曾經推動了歷史學的發展壯大。求真是歷史學持續存在的底線，缺乏求真理念，史學即使產生也會蛻化爲文學性的傳說或神話，歸於消亡。而在史學還不足以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社會系統的條件下，追求史學的經世致用功能，才會得到時人的廣泛關注、認可與支持，史家相信史學具有某種社會功能，也才會具備撰史的信心、熱情與責任感。史學欲求致用，就必然不同程度地造成失真，而治史求真的原則會促使史家起而糾正，整個機制往復運行，推動史學發展。史學最終會以強化學術性來克服這一矛盾，從而上升到新一層次，其機制是求真、求是與求新之間的矛盾，新的基本矛盾仍爲歷史學發展的動力。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和日新月異，使歷史的許多經驗已經與現實課題方枘圓鑿，不能相與比附。因此，在歷史學成爲相對獨立社會系統的當今，以史爲鑒的說法不僅失去在新時代的合理性，而且也是阻礙史學健康發展的因素。

按照以上思路追索，在史學史研究、歷史研究中，將會有好大的開拓空間和創新遠景！而我所考查的「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相互關係」，在整個思路中實在是最初級、很渺小的課題。這個課題雖然取得許多學術探索的突破和創新（這裡不贅，他處略述），但史學史研究的最高目標，是應當揭示歷史學發展的規律，而本書題材所限，尚未從理論上、實證上瞄準這個根本問題。對此，頗寄望於年輕的莘莘學子，謹此自序。最後，尚需草擬小詩，略爲抒發感慨之情。

七絕：題自撰《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相互關係研究》

春秋輾轉耗心神，世道紛紜探路津。

鬢髮飛霜方有見，長驅未曉是誰人！

喬治忠

2016年3月5日於南開大學上思齋



目次

上 冊

序

緒 論

- 一、本項研究的邏輯思路 1
- 二、學術界已有的相關研討 7
- 三、研究的難點與前景 13

第一章 清代以前的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 17

- 一、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產生 17
- 二、孔子與《春秋》關係之辯正 23
- 三、中國傳統史學官方與私家兩條發展軌道的形成 25
- 四、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多方探索 38
- 五、唐宋的史學成熟化及官、私史學之間的關係 54
- 六、元明兩代官、私史學的調整 63

第二章 清朝官方史學概述 73

- 一、清朝在修史制度上的建設 73
- 二、清朝官方記史與修史的起始 78
- 三、記載與纂修本朝史之基本格局的確立 84
- 四、官方史學的繁榮 94
- 五、官方修史活動的衰退 98
- 六、清朝官方史學的特點 102

第三章 清代私家史學發展大勢 109

- 一、環境與學風轉變中的私家史學 109
- 二、歷史考據主流與私家史學多樣化 121
- 三、道光朝之後的私家史學概況 129

第四章 順、康、雍時期官、私史學之錯綜關係 137

- 一、清廷內部鬥爭及官方的修史活動 137
- 二、順治、康熙時期官方對私家史學的鉗制與放鬆 151
- 三、雍正朝對政治歷史觀的整飭 159

第五章	清初至乾嘉時期官方與私家的明史學	171
一、	順、康兩朝官、私明史學的跌宕起伏	171
二、	《明史》的成書與乾嘉時期官方明史學的繼進	192
三、	官方在明史學上的再檢討	199
中 冊		
第六章	清朝「盛世」史學的組成結構	207
一、	清代對傳統史學大總結的社會背景	207
二、	乾嘉「盛世」史學發展的社會結構	218
三、	乾嘉兩朝官、私史學撰著之間的關係	240
第七章	乾隆帝與章學誠史學思想的比較	251
一、	乾隆帝的史學思想在官方修史進程中的發展	252
二、	章學誠史學理論的形成與特點	260
三、	乾隆帝、章學誠之史學思想的同與異	271
四、	乾隆帝與章學誠史學思想共同的價值取向	281
第八章	清朝「盛世」的史論與歷史觀念	287
一、	正統論標準的論定與撰史「書法」的更張	288
二、	對明代歷史問題的評論	296
三、	文字獄的勃興與查繳禁書	306
四、	對歷代史事的嚴密審斷	315
五、	私家史學的迂迴應對	322
第九章	清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關係	329
一、	清季官方史學的主要作為	329
二、	道光以降私家史學的嬗變	346
三、	清代後期官方與私家史學的關係	355
結 語		378
主要參考文獻		383
下 冊		
附錄：	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繫年要錄	391
後 記		595

緒 論

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相互關係的研究，在史學界是一個嶄新的學術探討，必須在清代史學史研究深化、特別是對清朝官方史學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才可能提出和探索。因此，對於本課題的思路、學術研究背景、難點和突破方向等等，有必要做一概略的說明。

一、本項研究的邏輯思路

研討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相互關係，這個問題的提出是以中國古代史學、清代史學的基本發展狀況為依據的。首先，必須認識到中國古代史學之中，存在著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之間相對應的關係，即官方史學、私家史學在史學發展整體中分為兩個不同的修史主體，各自具有相對的獨立特點，在史學實踐上具有大約旗鼓相當的活動規模。其次，清代也必須與此前的朝代一樣具備官方史學和私家史學兩大存在與發展的模式，並且帶有典型的特徵。如果以上史實得到充分的確認和研究，那麼合乎邏輯的學術思考就是：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之間的關係如何？這種關係對史學的整體發展有哪些作用？選取一個朝代或一個時間階段來剖析官、私史學之間的聯繫，就成為深化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如果不存在官方史學如古代西方的希臘、或不存在私家史學如清入關前的後金政權，當然也就無從探討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之間的關係。又如果不將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作為對等的修史主體看待，當然也不會產生研討二者關係的意識。可見在中國史學史學科內，必須充分重視和研究官方的史學活動，取得比較深入的認識之後，才有可能進而提出探討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關係的問題。

中國傳統史學的萌生，與西周初期「殷鑒」觀念的形成有極大關係，因為有了「殷鑒」的觀念，西周開始了對官方公文文獻的整編，這逐步形成最早的資料性史籍即《尚書》。此後，在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識的進展中，出現連續性地記載史事，其明確的目的是要留存記述以備查閱，可以從國家的盛衰、興亡之中汲取鑒戒。政治理念上的需求促使歷代統治者皆十分重視史學，中國史學本自官方產生，並且逐漸形成連續發展的、官方與私家史學並存的局面，這個基本格局在東漢時已經塑成。

具有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兩條相互聯繫的發展軌道，這是中國史學區別於西方史學的最顯著的特色。古代的日本及朝鮮半島出現過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並立的局面，那是因為受到中國傳統史學的影響，從而銳意仿照中國進行相應的修史活動。在中國古代，官方史學加上私家史學，就組成史學整體的活動內容，官方史學和私家史學雖然各有其獨立的史學活動，但二者的聯繫也是相當密切的。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關係，是中國傳統史學內在的一對矛盾，這種矛盾在主體上不屬於對抗性矛盾，而應為互動、互補又互有排抑的運行方式，但在強力的政治干預及大興文字獄時，官、私史學觀念也會出現對抗現象，因此，史學發展中的官、私互動，具體狀況是相當複雜的。剖析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之間的關係，實有助於深入認識中國傳統史學的發展機制。

中國官方史學從產生的本源上，就將史學與國家政治緊密地聯結一起，先秦春秋時期開始，各個諸侯國都有負責記史、講史的史官，三國時期史官成為一種專職，晉代的「著作局」乃是專門的史學機構，而從唐代開始，史館為國家必備的專設衙署，是官僚組織的一個構成部分，歷代相沿，直至清末。由於中國古代的史學活動納入政權建設和政治運轉，歷史觀念與政治思想融為一體，遂形成中國特有的「政治歷史觀」，即政治方針、政治見解多從對歷史的分析中得出，而且以歷史的事例來論證自己的政治見解，形成政治觀點與歷史知識的互動與循環。西周「殷鑒」思想即是這種政治歷史觀的肇始，西漢時陸賈遵漢高祖劉邦指示所著《新語》、隨後賈誼所撰《過秦論》等等，都具有既為政論又是史論的特點。古代史家大多是官員，或者是官方認可的教育體制所造就的士人，因而私家史學也不能遠離政治。源於「殷鑒」等官方理念的「垂訓鑒戒」、「懲惡勸善」、「資治」、「翼經」、「明道」等等經世致用思想，成為官、私史學共同的宗旨，其聲勢大於直書實錄的主張。史

學的學術性被壓抑在致用的原則之下，治史求真、記述如實的理念實際遜位於綱常、名教，所謂「史臣不必心術偏私，但爲君父大義則於理自不容無所避就」，〔註1〕意即如斯，這是私家的看法，而與官方的主張一致。官方與私家在史學思想上的頗多共識，掩蓋了官、私史學在互動並進過程中求真與致用之間的矛盾運動，使學者往往著眼於歷史著述的研究和比較，從而把不同史學活動的主體看成混沌一片，不注意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分野，也就沒有二者相互關係的概念，這是迄今中國古代史學史研究中的一大缺陷。筆者關注官方史學的作用和地位、提出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之間相互關係的研究，都是從重視史學活動不同主體的理念出發，來重新開闢史學史研討的思路。

官方修史要有多名官員參與，爲避免史文、體式的互相牴牾，史書的纂修在客觀上具有強烈的規範化的要求，自史書的結構到詞語的運用，無不講究義例。春秋時期官方記史即有「書法」，此爲詞語上的規範。司馬遷創立紀傳體史書，尚有不少機動靈活的特點，如爲項羽立「本紀」、爲陳勝撰「世家」等等。趨附於官方體制與官方機構採用紀傳體之後，越來越將義例規範爲固定的體式，摒棄了《史記》原有的靈活性，這一點早被清代史學理論家章學誠所批評，認爲班固《漢書》之後的作者，每沉愈下，「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註2〕。事實上，官方史學需要對史籍形式的規範化，而私家往往開拓出新的史書類型，新式史書可能再被官方採用和私家模仿，又漸漸規範化。官、私史學在互動中，擴大了中國史學的規範化空間，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典制史、「綱目」形式、會典等各種史籍，都形成較爲一致的撰寫模式。當然，體例規範具有一定的彈性，但史書一般都各自明定凡例，將彈性部分再次定成具體的規範。這種規範化的特點，總體上是源於官方史學。官方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機制中起主導作用，不僅史書纂修趨於規範化，而且史學思想、歷史編纂學理念也趨於規範化，思想的範式一旦形成，便較難變動，尤其是史學思想與儒學名教結合一體，保守性更加牢固。因此，中國傳統史學中史學思想、史書體式的發展狀況，也是與官方史學、私家史學兩條線路的互動相關的。

〔註1〕 章學誠：《章氏遺書》（劉氏嘉業堂刻本）外編卷三，《丙辰札記》。

〔註2〕 章學誠：《章氏遺書》（劉氏嘉業堂刻本）卷一，《文史通義·書教下》。

官方記載當代歷史的制度，保證了中國古代史料編輯的連續不斷，官方的史料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政局的變動，會被私家史學撰述所獲得和利用，官方撰修的史籍，同樣會被私家參考與取材，古代私家的歷史名著，大多是直接或間接依靠官方記錄、整理的史料來撰寫。私家史學的重要成就，諸如體例的創造、史實的考訂、學風的浸染，也必然受到官方史學的重視與採納。這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就在互動之中互為促進，使整個傳統史學具有內在活力，從而形成超越其它古代國度的興盛局面。這就是中國古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互動的一般狀態。

在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關係的結構分析中考察各種史學現象，把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之間互動關係，視為中國傳統史學發展中的根本性問題之一，應為進行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一個新的思路。

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之間的互動、互補又互有排抑，雖然不能囊括中國史學運行中的所有內容，卻是中國古代史學發展中最重要史學機制之一。探討中國傳統史學中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相互關係，對於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對於中國文化史、社會史的研究都有重大的學術意義，因為史學的興盛乃中國古代社會文化的一大特色，並且與國家政治機制結合密切，在歷史進程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相信通過中國古代官方史學和私家史學之間關係的探討，會展現出深化史學史研究的新視域、新方法，更清晰地揭示中國傳統史學繁榮發展的社會機制，從而進一步探討傳統史學作為重要構成部分的中國傳統文化。這是一個艱巨的學術課題，是前景廣闊的學術境地，需要史學界多人共同開發和認真研討。

那麼，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應當怎樣劃分呢？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上，官方史學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項內容：1、具有制度化、規範化的記史和修史機構，修史機構大多建置為等級性的官僚組織和管理方式；2、官方切實控制和管理下的史籍編纂，切實的控製表現於人員任用及組成、修史進程的安排、修史的內容取捨、思想導向等各個方面，但具體側重點各有不同；3、編纂成總量可觀的官方史料和官修史書；4、形成官方的歷史觀與史學思想；5、官方史學活動具備一定的政治作用和具有一定的學術地位。前三項是構成完整官方史學的基本要素，只有前三項內容大體具備，後兩項內容才有必要置於官方史學的範圍之內。

私家史學一般是指學者按自己意旨從事的史學活動，官方修史也是由各

個史官分別承當，但官方修史中的史官，都不是以他個人的獨立意願、獨立方式完成工作。而作為史官的史家，可以在參與官方修史的同時進行私家的史學活動，只要治史內容和治史進程脫離了官方直接控制和管理的範圍，就屬於私家史學。不言而喻，只要官方的史學活動進行，就必然出現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聯繫，不過這種聯繫在不同環境下，乃有強有弱、時隱時現而已。

在史館制度不太成熟或某種特殊情況下，朝廷也會將官方修史項目委託於有名望的史家來主持。這樣，在官方、私家不同主體之間，就產生了界限不太分明的問題。對此，判斷的標準應是看官方對史籍的修纂是否有著某種切實的控制和管理。北齊朝廷敕令魏收編撰《魏書》，繼而又令其專力纂修，不參政務。但魏收修《魏書》乃承襲了北魏多年纂修國史的成果，又有刁柔等多名史官共同纂修，非其一人獨撰。書成後，原北魏的官僚世家子弟多不愜意，毀譽紛起，眾口沸騰，北齊文宣帝令魏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弟當面辯論，隨之既懲治了一些詆毀者，也對魏收有所指責，又「敕魏史且勿施行」〔註3〕，此後終北齊一代，朝廷令魏收凡三次修改《魏書》，魏收卒後，又命史官再加修訂。〔註4〕是《魏書》的纂修，始終在北齊官方的控制和管理之下，應當歸於官修史。沈約的《宋書》大致相同，纂修歷程中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徐爰等許多史官撰有初稿，沈約是在已有史稿基礎上成書，且修史時受到朝廷的監控，《南史·王智深傳》就記載了齊武帝指示《宋書》撰寫要對宋帝「思諱惡之義」，敦促沈約刪削對宋孝武帝、宋明帝負面瑣事的記述。因此，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分野仍然是清晰的，標準在於官方是否切實地施行著控制與管理。可見從官方修史與私家修史的區別及聯繫的角度考察和研討，本身就會加深對中國傳統史學的認識。

我們在中國古代史學史的研究中，不能不注意到官方、私家這兩類性質不同的史學活動主體，不能忽視中國史學史上切實存在的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區分與聯繫的問題。中國各個王朝設置的記史、修史機構不盡相同，總的趨勢是在皇帝和朝廷的統一調控下，逐步實現組織嚴密化、條例明細化、管理官僚化，並且形成多種記史、修史機構並立和分工的局面，這一史學機制的發展成熟，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在清朝則達到了歷代的頂峰。

〔註3〕《北史》卷五六，《魏收傳》。

〔註4〕參見周一良：《魏收之史學》，載《燕京學報》1934年第18期。

清朝乾隆時期以編纂《四庫全書》和撰著《四庫全書總目》為標誌，形成對傳統文化的總結與清理，史學的發展也同樣進入一個大清理、大總結的階段。在這傳統史學總結的時期，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均出現了發達、興盛的局面，但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表現形態很有區別，不必以同一標準衡量。近代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認為「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註5〕，這是在他對於清代文化研究不足的條件下，單憑印象出發的一種說法。宋代史學固然興盛，而清代與之相比，各有所長，特別是官方的史學成就，後來居上，在水平上已顯著超越宋代。鄭天挺先生指出：「清代史學是有成就的，是和其它學術一樣有發展的。不僅如此，它還有突出前代的貢獻。」〔註6〕清朝官方史學的發展狀況，以乾隆朝為繁榮的波峰，前後皆顯低垂，呈一幅比較平滑的拋物線圖象，這就是說，清朝官方史學具備一條獨立的從產生、發展、興盛，而後又有所衰退的演化過程。而清代私家史學的發展，則另是一種樣態，撰著形式和著史宗旨隨治學風氣大有變動，不能以籠統的興旺程度加以描述。這樣，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之間的衝突、磨合、互動、互補、彼此消長且出現過嚴重的對抗，就具備豐富、多樣的文化內容，也特別複雜，值得作為研究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關係的標本。

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相互關係，還包含民族矛盾的內容，官方史學帶有頗多滿族統治者的思想因素，私家史學基本是漢族學者所掌握，但也不能不受官方思想的影響和控制。清朝官方史學必然在千年積累的中國傳統史學文化基礎上發展，但又往往表現出對「漢化」的防範和擔憂心理，這種複雜性也與宋、明等朝代很為不同。但清朝統治者重視史學，比較善於調節官、私修史之間的矛盾，通過修訂對歷史問題的評論口徑，適時放鬆文字獄，在強化儒學思想體系與綱常倫理規範的同時，取得官方與私家在歷史觀念上的趨同，使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關係從緊張走向緩和。從清初至清季，私家史學的史家群體，組成結構也發生很大的演變，不同身份的史家，對官方史學活動各自採取懸隔、關注、參與、合作、迴避等不同的態度，使官、私史學之間的關係處於十分複雜、多樣的狀態。

〔註5〕 陳寅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頁。

〔註6〕 鄭天挺：《及時學人談叢》，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322頁。

以上對於中國古代和清代史學發展總體狀態的基本估量，是進行本課題研究的出發點，是探尋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相互關係的思想基礎。

二、學術界已有的相關研討

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之間關係的研究，前哲與時賢在論撰之中或時有涉及，但將之作爲一個研討課題予以關注，則至今甚寡。梳理本課題研究的歷來狀況，勢不能不將一些相關論撰諸如研究清朝官方史學的成果攬入，雖然研究清朝官方史學並不同於研討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關係，但正如上文所述，重視官方史學的考索，是探討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關係的前提條件，研討清朝官方史學的論述中，也有時無意間涉及到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關係。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撰寫史學理論專著《史通》，很早就注意到官方史學活動的問題，外篇首列《史官建置》，專敘官方記史、修史的人員組織問題，但隨後《古今正史》篇沒有特別注重區分官修史與私修史。不過，劉知幾在是強烈地感受到了官方史學活動與私家史學之間矛盾的學者，他在《史通》各篇，屢屢尖銳批評官修史的記事失準、體例謬誤，連唐朝官方所修正史，亦致以譏議。《史通》的末篇《忤時》一文，其主要內容是劉知幾致史館總裁官的信件，堅決請辭史官職務，其中深刻地論述了當時史館修史的弊端，其中指出「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眾功，方云絕筆」〔註7〕。很明顯這是反對官方史館對史家的束縛，推重成一家之言的獨得見識。在《史通》卷十《自敘》篇，劉知幾再申其義說：「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官，再入東觀……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默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註8〕

這裡展現了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矛盾的一個側面，即使傑出史家，參與到官方史學活動之內也會「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只能私撰史著「以見

〔註7〕 劉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時》，清浦起龍《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90頁。

〔註8〕 見《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90頁。